

文化认同的美学与政治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关系研究

WENHUA RENTONG DE MEIXUE YU
ZHENGZHI

文化首先是一种政治，信仰某个宗教，归属于某个民族，坚守一种生活方式，提倡一种美学趣味，这些都不是无意识或习得的行为，它们已经成为自由、平等、民主乃至公正的基本体现和自然要求。全球化导致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剧烈碰撞和融合，以及商业化带来的文化消费与竞争，正在不断地改变『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文化转向』实质上是『文化的政治转向』，现代文化的本质也是政治文化。不管是先发的现代国家，还是后发的现代国家，以及那些被迫卷入现代的古老文明、原始土著，都参与了文化上的争夺，对物质文明的共享和共同崇拜并不能取消人类在精神价值层面的分裂和争夺。

张兴成 著



艺术与美学文库·学术系列



人民教育出版社

文化认同的美学与政治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关系研究

WENHUA RENTONG DE MEIXUE YU
ZHENGZHI

张兴成 著



艺术与美学文库·学术系列



人民大学出版社

策划编辑:柯尊全
责任编辑:秦 桑
装帧设计:徐 晖
责任校对:周 昕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认同的美学与政治: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关系研究/张兴成 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0
(艺术与美学文库·学术系列)
ISBN 978-7-01-010261-0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西方文化-研究 IV. ①G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91409 号

文化认同的美学与政治

WENHUARENTONG DE MEIXUE YU ZHENGZHI

——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关系研究

张兴成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文林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24.5

字数:420 千字 印数:0,001-2,500 册

ISBN 978-7-01-010261-0 定价:50.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导 论

现代文化政治冲突中的民族性与现代性

第一章

现代性与文化帝国主义

- 一、技术统治与媒介帝国主义 26
- 二、现代性与文化认同危机 31
- 三、全球资本主义与帝国 40
- 四、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 48

第二章

文化民族主义与反现代性思想

- 一、“民族主义：往昔的被忽视与今日的
 威力” 62
- 二、康德、启蒙与民族“自决”观念 78
- 三、赫尔德、反启蒙思想与文化多元论 94
- 四、费希特、海德格尔与“原生性”民族
 神话 121
- 五、尼采、“欧洲虚无主义”与德国的文化
 使命 139

六、现代文化政治中的“主体性重建”

问题 155

第三章

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

一、“自由的民族主义”是否可能? 175

二、社群主义、文化多元主义与“自由的民族主义” 184

三、“民族解放”与“人的解放” 198

四、民族国家、民主国家与文明国家

——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

..... 209

第四章

东方主义与“东方人的东方主义”

一、从“知识—权力”到异文化表述 261

二、“东方人的东方主义” 281

三、“第三世界批评”中的东方主义问题
..... 300

四、东方主义的全球扩散与西方主义

问题 315

五、民族性幻觉与中国人的自画像 332

六、无限衍生的东方主义话语 355

参考文献 364

导 论

现代文化政治冲突中的民族性与现代性

欧洲人,像所有人一样,想要黄金和奴隶;可是同时他们又想给自己树立雕像,就像是对奴隶做了好事。由于他们聪明伶俐,精力饱满又处在权力的鼎盛时代,就可以把自己文明的这两方面同时都表达出来;他们既得到奴隶又得到雕像。

——V·S·奈波尔(V. S. Naipaul)《河湾》

它是一个借来的现代化的残片又和劫遗的传统的圣骨遗骸奇妙地糅为一体的混杂之地。它的前途和它的渺远的过去一样遥不可知。但在这令人伤心绝望的背景下却有一个纯然使人震惊的智慧活力;一种真实的,大众性的哲学热情,去探寻实在的生存权的迷箴。

——克利福德·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地方性知识》



20 世纪后半叶以来，“文化”逐渐成为人文和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这主要是现代性全球扩张的结果。全球化不仅带来了世界同质化的危险，同时也催生了各种价值的差异性、地方性、特殊性和多元性诉求，文化成为无法全球一体化的最后堡垒，学界因此有“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和重新回到以文明作为分析架构的呼吁。^①特别是“9·11”之后，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泛滥使得亨廷顿曾经广遭批评的“文明冲突论”再次成为全球文化讨论的焦点。“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限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以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确定的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

① 金耀基：《全球化、文化转向与多元现代性》，《社会学家茶座》（第一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2 年版，第 4—6 页。

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①全球化既使“现代化”、“普遍主义”、“发展”、“接轨”、“世界主义”等话语成为时尚的“关键词”，同时也为“本土化”、“民族性”、“异质性”、“特色论”等观念的崛起提供了合法化依据。尤其是当全球化被理解为同质化、西化(美国化)、“麦当劳化”、英语化时，全球化就等同于帝国主义化和后殖民化了，在这种情况下，抵抗帝国主义的文化霸权，倡导文化的多元主义就成为今天最“全球化”的声音。

因此，人们对文化的强调，并非仅仅是基于对自己历史传统、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艺术、生活方式等等的自然传承和迷恋，而是强调这些因素已经成为我们政治身份和权利的重要组成与表达。文化首先是一种政治，信仰某个宗教，归属于某个民族，坚守一种生活方式，提倡一种美学趣味，这些都不是无意识或习得的行为，它们已经成为自由、平等、民主乃至公正的基本体现和自然要求。全球化导致的各种文化之间的剧烈碰撞和融合，以及商业化带来的文化消费与竞争，正在不断地改变“文化”的本质和内涵，“文化转向”实质上是“文化的政治转向”，现代文化的本质也是政治文化。不管是先发的现代国家，还是后发的现代国家，以及那些被迫卷入现代的古老文明、原始土著，都参与了文化上的争夺，对物质文明的共享和共同崇拜并不能取消人类在精神价值层面的分裂和争夺。当代的艺术、美学、文化理论、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都具有鲜明的政治色彩，文艺理论早已成为“政治诗学”。其中，民族性大概是文化政治中最为敏感，最为复杂，也最具代表性的因素，文化参与政治斗争最为激烈的形式也表现在民族认同、民族归属和民族身份等问题中。

现代文化政治冲突的典型是世界范围内的现代性和反现代性思想之间的对立，如果从民族国家的层面来看，可以将二者的对立的原型追溯到英法文化与德国文化之间的竞争。启蒙运动和现代化最早产生于英国和法国，而反现代化和反启蒙的文化批评却首先在德国形成潮流。德国人在遭受到来自

“西方”的现代化冲击时感受到的震惊不亚于晚清李鸿章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叹。德国思想家舍勒把现代

①(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

性的冲击概括为“事物和人的巨大变形”，海德格尔则喻之为人被“连根拔起”。其结果是，人类知识界不得不来搞清世界的这一巨大变形，不得不重新为人类的生存寻找地基，于是就有了围绕现代性问题的“现代学”和各种现代主义，在哲学和文艺领域的代表就是浪漫主义，在思想领域的代表就是历史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代表就是社会学。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明确表示，社会学“并不是有关人类社会整体研究的一门通用学科，而只是社会科学的一门分支，只关注‘发达的’或现代的社会”。因而“社会学是关于现代社会的理论”。^①德国人从19世纪以来，围绕现代现象展开了全面的“社会学”思考与探索，比如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研究与批判；滕尼斯对共同社会、礼俗社会与利益社会、法理社会的划分；西美尔对货币经济社会的人心和文化特质的探讨；舍勒指出现代人已经从休戚与共社会进入到竞争社会；韦伯则认为现代性就是“解魅化”的结果，人类从宗教的神魅化社会不断被纳入到一个合理化社会；特洛尔奇把现代性的标志划定为国家权力和国家观念的崛起；从尼采到海德格尔、施特劳斯则把现代性本质界定为虚无主义，上帝死后，人类陷入无根状态，丧失了基本的价值判断；贝克认为现代社会的到来意味着人类从危险社会进入到风险社会；等等。德国18世纪后期以来所有重大思想的产生，都可以说是对“西方”（英法）现代文化、现代生活方式、启蒙思想冲击下的直接“回应”。“德国浪漫主义及启蒙者将启蒙时代早期的社会学倾向思想家——如孟德斯鸠——所代表的倾向加以衍伸，从而创立了他们的文化民族主义的义理。事实上，他们非意识性地为日后的文化人类学、历史语言学、美学、法理学、神话学等打下了基础。也就恰是他们首先发展出了‘文化’这个观念，用来指明人们生活方式主观的独特性质。这个观念进一步发展而成为对某些类型文化引借的有系统的批判。他们为反现代化的批评建立了自己的词汇。”^②德国人在遭受“东西方文化冲突”后的思想反

①（英）吉登斯：《社会的构成》，李猛、李康译，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页。

②（美）艾恺：《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论文化守成主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页。

应,最深刻地表达了所有后现代化文明和国家的转型体验,这就是后来许多亚非反现代化批评总是要到德国人那里去寻找思想基础的主要原因。

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认为,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现代性是将统一性和普遍性观念强加于思想和世界之上的探索。现代性既被视为西方的规划,又被视作西方价值观向全世界的投射。现代性使得欧洲人可以把自已的文明、历史和知识作为普遍的文明、历史和知识投射给别人。^①后现代主义对文化的差异性、地方性、多元性、民族性等价值的张扬,正是对现代性“霸权”的批判。但问题是,后现代主义也正在成为一种新的霸权,它在摧毁各种“中心主义”、“一元论”的霸权的同时,也摧毁了那些同样建立在本质主义基础上,以差异性和特殊性为诉求的基础和传统,从而把西方现代性的霸权贯彻得更加彻底。当今学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是,现代性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坚持现代性是一元的学者认为,全球化就是把西方现代启蒙方案不遗余力地加以推广和实现,最终实现全球市场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使民主、自由、公正、平等、博爱变成普世性价值。批判这种一元论的学者则担心现代性的全球化变成全球西方化、美国化,因此,全球化必须是全球的多元现代化,特别是应该遵循全球文化上的多元现代性原则,发展适合于自身特色的、地域性的、民族性的现代性。但不管是“一元现代性”还是“多元现代性”,都是在“现代性”这个前提和框架下讨论文化问题,“现代”依然是一个不可逾越的绝对标准。这样思考问题,很难把我们从现代性话语结构和框架中摆脱出来,因此就有了挑战“西方—他者”的思维模式,重提“传统—现代”、“古—今”的思路,认为我们以往对传统和古代的认识都是从现代人的视角和目的出发的偏见,应该跳出现代视野,站在古代人的角度来审视现代性,这样我们才不会忽视或歪曲古人的智慧,为现代性困境找到新的思路,套用梁启超的一个说法叫“以复古为解放”。几百年的现代社会(像中国不

过一百来年),和几千年的古典社会相比,仿佛一个小孩儿,在文化上现代文化属于青少年文化,而古典文化才是成

① Mike Featherstone,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5, p. 10.

年或老年文化，青年文化有激情和无限创造力，但多少缺乏成年文化的深度、厚度和广度。全球化至多是一个空间化，或者说具体点是空间距离被消除的过程，但时间（传统、历史、文化习性等）却是很难在短时间消除的，对于地球上许多地方来说，“现代性”的确还是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其历史尚未展开。然而，目前的情况是“青少年文化”要取代“中老年文化”（列奥·施特劳斯认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青年造反运动”），必然导致文化上的肤浅化、平面化和游戏化成为主流，因此，需要“拉开时间的长度，以抗拒、抵抗、抵消全球化带来的空间距离的消失”，重拾古典文化的权杖。^①

当然，西方世界对自己的古典的尊重是否会延伸到对他者的古典的尊重？这依然是个问题。同样，西方人尊重自己的古典价值，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必须尊重自己的古典价值？如果因为西方人说我们的古典好，我们就说好；如果是西方人说我们应该抛弃古典，走现代化道路，我们就抛弃古典，走现代化道路，那么，我们就始终未摆脱“西化”的道路，因为我们始终是“唯西方马首是瞻”！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不管中与西、古与今、现代与传统、新与旧、普遍与特殊，都必须落实到一个基本的认识上来：什么是好与坏、真与假、美与丑、善与恶，没有这些最基本的价值判断，我们必然会陷入到各种相对主义和功利主义的价值冲突之中。

① 甘阳：《通三统》，北京：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68—73页。

二

本书主要从文化帝国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入手来理解现代文化政治和美学的主要特征和问题,讨论的中心是现代文化政治冲突的思想基础,具体辨析了现代性与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反现代性思想(主要是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想)、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东方主义与“东方人的东方主义”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希望通过厘清这些关系为我们思考和处理当代的民族文化冲突、文化认同、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重建等问题提供理论和思想史基础。

第一章主要探讨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形态和权力运作策略。本书对文化帝国主义的内涵的界定借用了英国学者的汤林森的概括,他指出,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论述主要有四种:第一,文化帝国主义作为“媒介帝国主义”话语。许多人认为现代媒介,特别是电子传媒是全球化时代帝国进行文化渗透与文化支配的主要形式。第二,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种“民族/国家”话语,将文化帝国主义看作是对民族文化认同

的威胁。现代社会是弱小的民族/国家不断争取得到“承认”(recognition),获得政治、经济和文化“自主性”的过程,这一问题不仅仅涉及地理范畴(本土以及外国文化),还涉及历史范畴(传统与现代)的转变。第三,文化帝国主义作为批判全球资本主义的一种话语,这种观点主要来自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将帝国看作是资本主义本身。文化帝国主义表现为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不是前面所说的某些具体的民族国家,文化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阶级关系扩散的工具。第四,文化帝国主义作为“现代性批判话语”,从最肤浅的层面来看就是反对同质性,倡导文化多元性,或者将现代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并加以批判。在深层次上,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触及到的是西方启蒙以来设定的现代性价值与方案的怀疑,尤其是对诸如“自由”、“发展”、“进步”之类的抽象概念背后的霸权性的深刻批判。^①

我们也强调文化帝国主义是现代性的结果。现代性作为一种源于西方的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社会生产组织模式,已经成为席卷全球的一种最为强势的文化力量,以现代性作为基本的标尺,一切非现代的文化价值都面临着对自己存在的合理性进行重新论证的困境,都必须对自己的文化判断标准进行修正、重组,即所谓的“现代转换”。具体来说,把现代性视为文化帝国主义的主要动因,意味着必须打破把某一个民族国家视为帝国主义的传统思路,而是把帝国主义解读为渗透到我们所有生活领域乃至无意识世界的一种文化强力,它在不同的层面的代表形式有所不同,本书主要从四个层面展开,第一个层面是技术文化,尤其是现代电子传媒的力量,形成了所谓的媒介帝国主义。电子传媒技术不仅改变了世界的时空距离和人类的交流方式,也带来了新的社群组织、参政议政模式和人格心性,通过媒介的力量,人类的文化视界在走向多元、复杂和丰富的同时,却不可避免地越来越趋于“同质”,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娱乐形态等正在成为全球性的文化,甚至凸显出霸权特色。第二个层面是从当代人的文化认同危机层面展开的,当人类都趋于选择现代性价值,或

①(英)汤林森:《文化帝国主义》,冯建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57页。

者以“现代”与否作为真善美的判断标准,把“进步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等现代化目标等同于善的、美的、真的,结果必然导致一切传统的、非现代的乃至非西方的价值遭遇认同困境,许多民族国家的传统文化价值面临着被抛弃和重新筛选的危险,人们的诸多文化习性和文化皈依在急剧的变革与转换过程中迅速瓦解,“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人类开始与其固有的文化传统疏离,在精神上不断地偏离自己的“故乡”,不断地引进现代性这个“异教神”,最后变成精神上的无家可归者,所有人分享的可能都是那些毫无个性、整齐划一、不断复制的、程式化的、冰冷的工业文明带来的文化产品。当今世界的身份政治(民族主义、女权主义、肤色理论、少数话语、同性恋运动等)不断张扬文化认同问题,这正是现代性带来的必然后果之一。第三个层面,把文化帝国主义视为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一种表征,从政治制度和经济模式乃至权力运作策略等角度来看,文化帝国主义的最基本动力来自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资本主义是最能激发人类欲望的一种制度,它把所有的人都逼成经济动物,算计和数学精神成为现代人灵魂的基本样态。资本主义把一切文化都改造成商业文化和消费文化,它既使一切文化像物质一样无限繁荣、热闹,也使一切文化丧失了独立自主和超凡不俗的气韵灵光;它可以使人类的文化表现出无限多元和个性十足,但在“多元”与“个性”背后却隐藏着资本主义的狡猾和随物赋形的能力,它不过是以“民族性”、“本土性”和“差异性”作为打开每一扇封闭大门的钥匙而已。资本主义全球化正在把帝国的攫取、占有和唯利是图精神变成整个人类的行为规范。第四个层面是从价值层面思考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形态,把现代社会的主要价值形态——自由主义作为讨论的中心问题,自由主义是不是一种文化帝国主义?西方现代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手段不仅仅是“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交通的极为便利”和“商品的低廉价格”,还有极其诱人的价值观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权和博爱,这些价值究竟是不是普遍的价值?抑或是西方世界把自己的特殊的文化价值通过物质和军事等强力论证成的一种普遍主义?这是多年来人们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本书主要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关系角度来讨论这一问题。



三

第二章主要考察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基础,我们把问题集中在现代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的第一波——德国浪漫主义思潮上。德国浪漫主义思潮是在“西方”(英国和法国)现代性冲击下的第一次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文化运动,现代民族主义的许多思想源头和观念,比如文化归属、文化认同、文化的本真性、文化的自决以及“承认的政治”等等观念都源于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这些观念在当代思想界不断地被人们重新阐发,成为文化批评界的流行语和关键词,得以广泛运用。更为重要的是德国文化民族主义已经成为现代性冲击下的各种文化抵抗形式的原型,后来的文化民族主义反应几乎都可以在德国浪漫主义思潮中找到先行的踪迹。

18—20世纪德国民族主义的发展过程始终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是与英法世界的较量,德国要创造另一个不同于英法的现代性;一是德国从分离到国家统一,再到强国和帝国的进程。德国人从多元主义的文化民族主义开始起步,在难以抗衡英法帝国主义

文化时,倡导文化平等,否定任何文化优越论(赫尔德),其“反启蒙思想”具有积极的反帝国主义意义;在19世纪前期,德国在面临法国拿破仑侵略和追求统一的过程中,开始强调本土文化的优越性,民族文化成为国家意志的体现(费希特),虽然对于德意志国家的统一和强大有着积极的意义,但文化的极端政治化已经为其后来的帝国化倾向和军国主义危险埋下了伏笔;到19世纪后期,德国文化的任务不再仅仅是帮助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崛起和独立,而是进一步巩固国家地位,甚至帮助国家发展成新的帝国,其策略是必须把德意志文化论证成为超越英法现代性的另一种统治世界的普世价值(尼采、韦伯、海德格尔)。德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这个“三段论”其实具有相当大的典型性,对那些有帝国幻想的后现代化国家充满了吸引力。对于当代中国知识界的“文化复兴”和“文化主体性重建”等诉求来说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启示和警示作用。因此,如果我们像以往那样,仅仅把德国浪漫主义理解为审美主义的或存在主义的思潮是相当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思考其审美主义和存在主义与德国的建国历程和普世主义诉求,以及19世纪德国的国家主义乃至后来的极权主义、纳粹主义之间的关系。

针对这些问题已经有一些非常深入的探讨和研究,比如德国思想史家梅尼克(Fridrich Meinecke)的“三部曲”(《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马基雅维里主义》、《德国的浩劫》)^①和卢卡契的《理性的毁灭》^②、卡尔·洛维特的《从

黑格尔到尼采》^③等,本书选择从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德国浪漫主义批判入手,原因在于:首先,汉语世界从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哲学以及审美现代性角度探讨德国浪漫主义的论述较多,从自由主义的角度审视德国浪漫主义虽也不少,但多流于一种简单的、姿态性的否定和批判,缺乏深入的思想史考察

① (德)弗里德里希·梅尼克:《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孟钟捷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马基雅维里主义》,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德国的浩劫》,何兆武译,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② (匈)卢卡契:《理性的毁灭》,王玖兴等译,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③ (德)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版。